



华夏文摘增刊
文革博物馆通讯（七〇八）

CHINA NEWS DIGEST — CHINESE MAGAZINE (CND—CM)

• — • — • 中国新闻电脑网络 (CND) 主办 • — • — •

—— 增刊 第八七六期 ——
(二〇一二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出版)

本期目录 (zk1212d)

【亲历者言】	我参与处理广西文革遗留问题	晏乐斌
【史海钩沉】	毛泽东的“老朋友”纪登奎	彭劲秀
【文革一页】	我在“文革”专案组的日子	徐兆淮
【人物追踪】	李讷在“文革”初期	阎长贵·王广宇

小启：本期通讯所刊载的材料已经全部增补到网上《文革博物馆》“最新展出厅”及各有关“展厅”，欢迎前往参观。

文革博物馆》网址：<http://museums.cnd.org/CR>

欲订阅本刊《文革博物馆通讯》请致函 cnd-info@cnd.org 获取订阅资讯。

来稿请投寄 tougao@cnd.org。请在 subject 中标明 CR 字样。

【亲历者言】

我参与处理广西文革遗留问题

• 晏乐斌 •

一、广西“文化大革命”浩劫

1981年4月至6月，我被公安部抽去参加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中共中央办公厅、中组部、公安部、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组织的“中央赴广西落实政策，文化大革命问题调查组”，1983年4月至1984年1月，又被公安部抽去参加中共中央组织的“处理广西文革遗留问题工作组”。下面记述的是我们调查了解的广西“文化大革命”中出现的部分问题。

◇ 死死捂住广西“文革”的盖子

广西在“文革”中是全国的重灾区，死人很多。可是“文革”结束后，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的路线方针政策得不到贯彻执行，生产上不去，经济滞后，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全国倒数第二，改革开放的方针在这里当做资本主义道路来批判，农业生产上的联产承包责任制当成资本主义尾巴来割。在思想战线上，两个“凡是”之外，广西还多一个“凡是”一直在坚持，即“凡是韦国清同志批示的、指示的都要坚决照办”。

粉碎“四人帮”之后，广西出现一股奇谈怪论，说“广西文化大革命中一直是顶住林彪、‘四人帮’的干扰破坏，贯彻一条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说“全国其他地方执行林彪、‘四人帮’路线，广西没有”，等等。广西的造反派控制着各级党、政、军、企、事业单位的大权，并自成体系，向中央封锁消息，捂住盖子。谁要是触犯了他们，揭露了广西问题，轻则受到打击报复，撤职调离，重则受到镇压，判刑投入监狱劳改队，甚至处死。上世纪80年代初，中央慢慢察觉和发现了广西的一些问题。

◇ 中央第一次派调查组

1981年4月，中共中央书记处组织了20多人的调查组，赴广西调查了解落实政策和“文化大革命”中的问题。我们一行在广西工作了两个多月，听取了自治区党委、政府和有关部门的汇报，调阅了部分档案材料，分别到南宁、武鸣、桂林、临桂、马山、凤山等地、市、县和几个监狱、劳改场所，还召开了一些座谈会，收到人民来信3000余件，接待群众来访700多人次，广泛接触了各方面的干部、群众。

可是我们在那里工作的两个多月里，工作组每到一处都受到区党委派来的人的严密监视，为我们设置重重障碍。我们是6月23日结束工作离开南宁，6月25日回到北京。刚回到北京，自治区党委办公厅副主任钟绍瑾等5人控告我们调查组的材料，就已送到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的办公桌上。“后来韦国清同志看了（我们调查组的报告），也（向中央）写了很长的控告、反驳（我们调查组）”。（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副书记王鹤寿1984年1月14日下午在听取广西区党委汇报处理“文革”遗留问题工作时的讲话）

◇ 中央第二次派工作组

1983年3月，为了稳定广西的局势，中共中央作出决定，以“中央机构改革领导小组赴广西工作组”名义，派出一个40人的工作组，赴广西协助解决、处理“文革”遗留问题和领导班子问题。

1981年的调查组只是调查了解情况，无任何权力，而这个工作组中央给了一些实权，如工作组的正副组长参加广西区党委常务会议，工作组成员根据需要，有时列席常委会议，有一定的决策权力。当时我负责掌握了解区党委办公厅、组织部以及自治区公、检、法、司法、安全（正在筹建中）处理“文革”遗留问题的进度、问题、领导班子建设、班子成员人选和清理“三种人”的问题，随时向工作组组长提出报告与建议。1983年3月，中共中央调整了广西壮族自治区党政领导班子。

工作组受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宋任穷、习仲勋的直接领导和过问。工作组领导班子成员有李锐、周一峰等人。工作组于1983年4月初至1984年1月下旬，广泛接触了广西各方面的人士，并直接派人参加一些自治区党政机关处理“文革”遗留问题的工作和考察领导班子情况，就重大事件、重大问题派出工作人员配合区党委，进行重点调查了解。自治区党委、政府为了处理解决好“文革”遗留问题，组织了相应的“处理文革遗留问题工作组”1000多人，分赴全区12个地市和一些大型厂矿企业单位、大专院校。各地市又都派有工作组到各县市，全面地开展处理“文革”遗留问题。我们工作组在南宁期间，接待群众来访达8000多人次，收到群众来信2万余件。全区处理“文革”遗留问题的工作一开展，各级领导班子经过调整与加强，广西问题的眉目逐渐清楚起来。

二、死人问题

“文革”期间的死人问题，是广西的特殊问题，是我们调查组、工作组到广西后广泛接触到的一个最普遍、最尖锐的问题，也是一个带有爆炸性、危险性的问题。

◇ 广西“文革”期间究竟死了多少人

1979年1月，区党委向中央报告称：1967年、1968年两年，全区“非正常死亡”4.4万人。1981年调查组到广西时，据自治区处理“文革”期间非正常死亡问题领导小组办公室（由区党委书记赵茂勋主管，公检法三长参加，简称“三人办”）汇报，1967、1968年两年，全区“非正常死亡”4.4万人，其中，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2.7万多人，干部、群众1.7万多人（不包括自杀数）。

当时全区12个地市，我们调查组仅据南宁、桂林、玉林、钦州4个地区和南宁、桂林二市党委的汇报，“非正常死亡”就有4.7万人，如果加上其余6个地市和区直机关以及柳州铁路局单位，死亡不少于10万人。1981年6月30日，区党委第一书记乔晓光向中纪委汇报时说：“文革10年，广西死了（非正常死亡）70400人”。有的干部、群众反映死了20万人，也有的说死了50万人。当年韦国清同志与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何兰楷私下谈话时，说广西“文革”中死了15万人。众说不一，各执一词，究竟死了多少人，谁也说不清楚。

1984年1月，我们赴广西工作组行将结束、广西处理“文革”遗留问题进入扫尾阶段时，自治区“处理文革遗留问题办公室”根据全区各地（市）、县、公社“处理文革遗留问题办公室”报上来的统计表明，全区“文革”中有名有姓有地址的死亡人数有8.97万人，其中，两派武斗死亡3700人，逼死7000人，其余7.9万多人，是有组织、有计划、有领导地打死和枪杀的。南宁地区14个县，死人在千人以上的就有8个，光一个宾阳县就死了3777人。另外，全区失踪2万余人，无名无姓的死者3万多人。

◇ 死的是一些什么人，怎么死的

1981年自治区“三人办”向中央调查组汇报说，广西“文革”中死人，一是武斗打死的；二是刮“十二级台风”，贫下中农处决了一批四类分子，这是多数；三是造反派乱抓乱杀保守派的一些人，保守派翻过来后也乱抓乱杀了一些造反派。1981年的调查组和1983年的处理“文革”遗留问题事实证明，这个说法掩盖了事实真相。

事实真相是：

一是乱打乱杀的多，武斗死的少。桂林市和桂林地区是武斗比较激烈的地方，但在1967、1968年两年死亡的11027人中，也只有458人死于武斗，占4.1%。南宁地区的武鸣县死亡的2197人中，武斗打死的仅3人。还有许多县、市根本没有发生武斗，也死了很多人。

二是干部、群众死的多。南宁地区14个县、市（不含自治区、地直属单位），死亡16494人，其中干部、工人、社员死9739人，占57%，四类分子及其子女死6755人，占41%。桂林地区“文革”中死亡的11612人中，干部、群众死亡7461人，占64.2%，四类分子及其子女死亡4151人，占35.8%。临桂县死亡1865人，干部、群众死亡1406人，占74.8%，四类分子死亡458人，占25.2%。

三是对立派“4·22”死的多，掌权派“联指”死的少。如，马山县死亡的1262人

中，“联指”成员仅4人，绝大部分是对立派“4·22”成员，四类分子死414人。凤山县城厢公社死亡的285人中，持“联指”观点的3人，是在武斗中打死的。临桂县死亡的1865人中，“联指”成员只有3人，是在武斗中打死的，其余1862人是有组织有领导地杀死的。武鸣县葛阳大队杀死73人，一个“联指”成员也没有。

1981年自治区“三人办”向中央调查组汇报说，死人主要发生于从湖南、广东刮来的“十二级台风”，由“贫下中农处死了一些人；革委会刚成立，因为没有权威，群众乱杀了一些”。这个说法也是站不住脚的。根据1981年我们调查组和1983年处理“文革”遗留问题自治区各级“处理文革遗留问题办公室”上报的结果，杀人是组织、有计划地进行的，而且多数是在革委会成立后有领导地进行的。

◇ 大批死人的历史背景

广西“文化大革命”初期，没有分成明显的两派。1967年3月，广西军区找各群众组织商量，要求支持韦国清站出来领导广西“文化大革命”。当时有的群众组织提出要韦检查后再定，而区直机关群众组织“公安兵团”、“红色监察”、“造反兵团”等则同意无条件支持韦国清站出来。4月29日，区党委书记伍晋南、贺希明、霍泛三人发表声明，支持前者，反对无条件支持韦国清站出来搞“三结合”。于是，围绕着“支韦”还是“反韦”问题，形成了两派，前者称“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联合指挥部”（简称“联指”），后者称“4·22”。两派形成后，从军队到地方，从自治区领导机关到各个基层单位，形成了两大对立阵营。

广西军区开始是支持“联指”的。1967年8月24日，周恩来第五次接见广西两派代表，表示支持“4·22”。广西有大批干部随即表态支持“4·22”，广西军区也检讨了支一派压一派的方向路线错误，转而表示支持“4·22”，但实际上仍暗中支持“联指”。当时在全广西，除桂林市外，“4·22”都处于劣势地位。1968年2月，由广州军区下令，将支持“4·22”的军队调走；4月，广州军区司令员黄永胜内定“4·22”为反动组织，于是开始压“4·22”。这是当时的基本形势和情况。但是，死人最多集中在三个阶段，也可以说是三个高潮。

第一阶段，1967年冬至1968年春，主要在农村全自治区刮起了一股“红色风暴”，说是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及其子女起来造反，要杀干部群众，说“你不杀他，他就要杀你”，于是在农村中成立起了“贫下中农最高人民法庭”，搞群众专政，杀了一大批四类分子及其家属、子女，也乘机杀了一些“4·22”观点的人。其中靠近湖南零陵地区的桂林地区各县，尤为严重，有的四类分子之家被全家杀绝。“灵山县谭礼大队民兵排长黄培立召开民兵统一行动，把地、富及其子女全部杀掉，全大队共杀了130多人，财产、房屋没收盖礼堂，禽畜、粮食全部吃掉”（中纪委、组织部等六部委《关于广西落实政策情况的调查报告》附件之一，1981年7月15日）。1968年3月，上思县武装部长段振邦在县四级干部会上说：“过去我们对敌人专政，要经过公安、法院，现在不需要了，现在实行群众专政，不杀掉那些东霸天、西霸天，群众不同意”。全县于同年的三、四月间乱杀了一批四类分子及其家属、子女和被认为是坏人的人。临桂县1967、1968年两年打死的1865人中，被打死的四类分子及其家属、子女459人。灵山县“贫下中农造反总部”（“联指”）于1968年初，召开会议全县统一行动。全县共杀死2900多人。他们用“种花生”指枪决，“种芋头”指石头打死，“种甘蔗”指木棒打死等暗语统计杀人数字。当时被杀害的贫下中农、干部、群众，在1983年全区处理“文革”遗留问题时，他们的遗属与子女还可以去找政府、党委落实政策，要求给予一定的抚恤与生活补助，要求追查凶手，可是四类分子及其家属子女他们去找谁，向谁去申冤啊！

第二阶段，是各县革委会成立前后，其名义之一是保卫红色政权，二是抓“反共救国团”。广西各县大部分在1968年春夏期间成立革委会，杀人是组织、有计划地进行的，且多数是在各县革委会成立后有领导地杀的。上思县成立革委会后，在县革委会主任、县武装部长段振邦的组织、策划、煽动下，造成1639名干部、群众和四类分子被杀，其中，被杀的国家干部162人，工人61人，城镇居民18人，学生5人，社员632人，四类分子761人；老游击队员48人，共产党员97人，共青团员13人。宜山县革委会成立后，由县革委会主任、县武装部政委季德春、县武装副部长李庆余、作战参谋蒋国志、民兵科长吴先水与原副县长崔振铎、原县委副书记王德茂等人策划下，于1968年6月11日召开了“向阶级敌人发动猛烈进攻”的全县万人大会，在大会上当场打死干部、群众11人。会后，各公社仿效、推广，均成立了以民兵为主体的“保卫红色政权指挥部”，群众称之为“杀人部”，向阶级敌人专政。从此开始，该县共死亡1400人，其中，两派武斗死几十人，县革委会成立前乱打乱杀死亡300多人，革委会成立后，由季德春等人策划、煽动，有组织有领导地杀害了900多人。宾阳县革委会成立后，从1968年3月至1969年10月期间，在县革委会主任、6949部队副师长王建勋的策划、组织、指挥下，以“保卫红色政权”、“向阶级敌人发动猛烈进攻”等名义，致使该县乱打乱杀，逼死了3890余人，是南宁地区死人最多的县之一。

广西军区、广西壮族自治区革筹小组出于政治目的，于1968年6月17日，将1950年代和1960年代初已被破获结案、审判处理过的玉林县石南公社梁福隆等人组织的“中华民国反共救国团广西分团第十大队”为主体，和浦北县六万山区的“罗平党”案等，拼凑成1968年4月“破获”了“中华民国反共救国团广西分团”的“反革命集团案件”，向自治区各地、县、市张榜公布案情，号召开展“大检举、大揭发、大斗争”。同时还把这个“反团”案与“4·22”群众组织挂钩，混为一谈，联系起来“大检举、大揭发、大斗争”，于是一场大规模的“剿灭反共救国团匪徒”的活动，在广西全区城乡普遍开展，把参加“4·22”组织或倾向“4·22”组织的干部、群众，加上“反共救国团”罪名，不经过任何法律手续，杀了一大批。融安县受迫害的干部、群众上访团对我们工作组来信反映：“从1968年8月14日县革委会成立到9月底一个半月的时间里，全县杀了三千多人。其中县革委会机关所在的长安镇，杀了八百余人。大将公社小圩镇龙妙街杀死45人，成了寡妇街，至今每逢过年过节到处是悲惨的哭泣声。有些老人讲：当年日本强盗侵占长安镇，进行屠杀时一天最多杀了17人，而1968年8月21日，一天就杀了100多人。他们愤慨地讲：这帮杀人强盗，真比日本鬼子还凶残狠毒。”

在老革命根据地凤山县，“文革”开始后，以老红军营长廖熙英为首，以革命老人、老游击队员为骨干，成立“革老派”，副县长覃家修也支持“革老派”观点。广西两派形成后，“革老派”支持“4·22”。当时同意“革老派”观点的群众、干部占全县人口的95%。由于“革老派”力量雄厚，1968年2月占领了县城，“联指”逃去东兰县。广西区革筹、广西军区公布“反团”案案情之后，凤山“联指”派组织乘机于7月7日发出关于围歼“中华民国反共救国团凤山分团覃、廖匪帮”的总反击令，又调去了11个县的武装民兵，配合6911部队围剿“革老派”，名曰“剿匪”，实为协助逃跑在外的“联指”打回凤山，“革老派”被打死打伤20人，抓走16人（其中13人被杀），“联指”夺回了县城，“革老派”全部逃往农村。县革委会成立后，上面派去了9个县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配合军队进驻凤山，“革老派”的大小头目大部分被杀，一部分被抓。全县被抓6000多人，批斗了5000多人，杀死了3000多人。有的全家被杀光，很多军烈家属全家也被杀光，许多老红军、老游击队员被杀，全县地下党被打成“叛徒集团”。可是1981年5月凤山县委向我们调查组汇报说：1968年6月至10月死了1197人，占当时全县人口的1%。显然没有说实话。玉林地区1968年在围剿“反共救国团”运动中进行的大屠杀，是时任玉林军分区政委甘照寰拍板，参谋长达志、地区造反派头头王×镇主持召开各县革委会、武装部负责人会议布置的，共逼死、打死几千人，其中，陆川县杀害1200多人，容县逼死、打死1392人。原凌云县委书记赵××是被三

个人拉出去杀的，当时赵见到县武装部长说：“你要救我呀！”可是这个武装部长不理睬，就这样把赵拉出去杀了。

第三阶段，是发布《七·三布告》以后。这个时期，农村“4·22”的大小头头和骨干大体已被用“反共救国团”的罪名消灭得差不多了，掌权者和扶持的“联指”造反派于是挥戈向城市开刀，集中表现在湘桂铁路线上的南宁、桂林二市。

1983年处理“文革”遗留问题阶段的调查证实，《七·三布告》是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的名义于1968年7月3日批准发布的，在这之前的1968年4月，广州军区司令员黄永胜根据广西军区、广西革筹小组的报告，内定“4·22”是反动组织，将对立的两派设立据点，策划组织武斗，打死干部群众，杀人放火，抢掠越物资、武器，抢部队武器弹药，阻断铁路交通等罪名，都加在“4·22”一派的头上。就在这时人民解放军驻广西某部打下“U-2”美国间谍飞机，林彪要接见有功人员，由广西军区副司令员焦红光带队赴京，事先区革筹小组主要负责人亲自授意整理了“4·22”的材料，报给林彪，《七·三布告》就是这样产生的。广西革筹小组、广西军区和广西“联指”造反派有了《七·三布告》这柄尚方宝剑，他们控制的报纸、电台，大造舆论，把“4·22”组织和其他持不同意见的群众，当成敌人，在南宁、柳州、桂林三市，在军队、武装民兵和“联指”武装人员三面包围之下，被彻底打垮，已经放下武器的“俘虏”，又被大批屠杀。

南宁市在《七·三布告》公布后，广西军区副司令员兼南宁警备区司令员、区公检法军管会主任宋治平、南宁警备区政委韩仕福、副司令员印玺、副政委慕石起等人，于7月28日在南宁警备区召开党委扩大会议，传达军区、区革筹小组命令，“用武力围剿南宁市解放路、新华街、南宁市百货大楼、区展览馆、邕江上停泊的轮船对立派据点。会后，调集了南宁地区14个县的武装民兵，调动了6912部队、6966部队、6936部队和军区警卫营、99部队部分官兵，以及‘联指’派武斗人员共三万多人，由印玺、慕石起指挥，与造反派一起，向解放路、新华街、展览馆、邕江上的轮船等处，发起猛烈攻击，动用了八二迫击炮、无坐力炮、火箭筒、炸药包等武器，7月31日猛攻开始，当天攻下展览馆，8月8日全部攻下，围剿、屠杀群众造成万余人死亡的严重事件。仅事后南宁火葬场负责火化的尸体就有5000多具，有人看见，解放路打下后，有20多辆翻斗卡车拉了三天的尸体，有的拉到市郊煤矿的坑道里，有的抛到邕江。为掩人耳目，抬尸体的‘4·22’成员也被‘联指’打死，当时邕江下游的西津水电站闸门被漂去的尸体堵住了。”“8月8日，部队和‘联指’攻打解放路全部结束。解放路及其附近33条街巷被炮击中焚烧成了一片废墟。据1983年处理‘文革’遗留问题时调查，解放军和广西‘联指’攻打解放路这一带，共烧毁33条街巷，其中烧毁机关、学校、工厂、商店和民房共2880多座（间），建筑面积46万平方米，使街道的5个公社、一万多户、五万多居民无家可归，仅国家财产损失价值6千万元以上”。（广西文革大事年表编写小组：《广西文革大事年表》第116页，广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广西“4·22”全部覆灭。三个据点攻下后，有的投降，都被“联指”成员杀害，有很多人钻了防空洞，钻防空洞的人，绝大部分被一场无名的大水夺去了生命（系“联指”造反派往防空洞里灌水所致），有的被各县民兵押回在途中杀死。“据不完全统计，仅围攻解放路和展览馆打死1470人，抓获俘虏9845人……分别关押在区文化大院、区电业局、南宁二中、九中、天桃小学、区、市看守所等10多个单位。关押在区看守所的265人，区交通学校711人，南宁幼师441人；有的被当作‘杀人放火’、‘四类分子’、‘坏头头’、‘国民党残渣余孽’、‘反共救国团’等罪名的‘要犯’、‘首犯’处理。被‘俘虏’人员交各县民兵拉回去处理共7012人，其中在拉回途中打死和拉回后打死的有2324人，当作‘要犯’长期关押的46人。”（广西文革大事年表编写小组：《广西文革大事年表》第115页，广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

三、桂林“八二〇事件”

广西区革筹小组、广西军区、广西“联指”造反派在解决南宁问题，围剿、拔除“4·22”据点之后，又着手解决桂林问题，策划、制造了桂林“八二〇事件”，一万余名群众被无辜杀害，造成了极其严重的后果。

◇ 事件发生前桂林的“文革”情况

“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桂林和广西其他地区一样，群众组织因支持韦国清和反对韦国清分裂成两派，前者为“联指”，占少数，后者为“革命造反大军”（简称“老多”，即“4·22”）占绝大多数。1967年下半年开始，两派多次抢枪武斗。“4·22”三次抢了各种枪支3000余支、加农炮8门。“联指”四次抢了各种枪支7000余支，机关枪10挺。仅1968年6月6日至13日的7天内两派发生武斗17次。6月下旬，“联指”在桂林军分区的支持下，以“保卫革命委员会”名义，从全地区12个县调集数千名武装民兵进城，形成对“4·22”的包围，导致大规模的武斗。两派在湘桂铁路两侧设立据点，不断冲突，迫使铁路中断。《七·三布告》公布后，周恩来于7月25日在京再次接见两派群众组织代表，提出立即停止武斗，上交武器，恢复交通，动员进城民兵回乡。同时，由驻桂林的6955部队派出人员，进驻两派武斗据点，实行武装隔离。8月8日，桂林地、市革委会和驻军支左小组，又一次发出通令，要求两派必须在8月12日停止武斗，上交武器。桂林军分区政委陈秉德也于1968年8月10日向“4·22”表态：“只要‘4·22’交枪，保证不抓人，‘联指’也交枪。”

经过上述工作，两派于8月12日停火，当晚铁路通车。“4·22”于8月13、14日向公检法军管会交出3000余支枪，拆除了工事，恢复了市内交通，部分人员集聚在市工人文化宫，等待办学习班。与此相反，“联指”只交了30余支枪，工事未拆，据点未撤，调集来进城参与武斗的武装民兵未回乡，且将武斗人员以市革委名义，改编为武装的“工人纠察队”，配发了一部分“4·22”上交的武器。

◇ “八二〇事件”是如何策划、发动的

“八月初，广州军区在湖南衡山开会，黄永胜主持会议，广西军区、桂林市武装部、桂林军分区负责人参加了会议。会议主要内容是落实《七·三布告》，研究出动军队，武装解除武斗据点”。（广西文革大事年表编写小组：《广西文革大事年表》第113页，广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据桂林驻军支左小组成员、市革委会政法部长、后5048部队副政委朱兆富同志反映：1968年8月初，广西军区政委魏佑铸在北京向参加部队学习班的广西军区的同志讲：广西问题怎么解决，请示了黄永胜，黄让广西自己拿出办法。经军区研究，先在融安县下手，动用军队，对400余名“4·22”成员，用武力解决。事后，向黄永胜汇报时，黄表扬干得好。这样就摸了中央的底，拟定了用武力解决桂林问题的行动计划，并将广西军区副司令员吴华，由南宁调到桂林，将正在北京参加学习班的桂林军分区司令员景伯成叫回，共同指挥了这一行动。原广西军区副司令员、后离休居住桂林的老红军姜茂生同志反映，“八二〇事件”之前，黄永胜在北京召开秘密会议进行研究，是林彪叫开的，吴华等来桂林指挥的。桂林驻军支左小组成员、104部队处长王汝保同志反映：“八二〇事件”行动时，部队有一个统一的指挥部，由吴华、景伯成、桂林市武装部政委陈秉德三人组成。据这些当事人的反映，“八二〇事件”是在北京预谋，经黄永胜批准，由部队参与，依靠“联指”，调动武装民兵，对“4·22”、干部、群众进行血腥屠杀是有组织、有计划、有领导地进行的。

◇ 事件经过

1968年8月20日，桂林地、市革委会和桂林警备区司令部、政治部，联合发出公告，

以进一步落实《七·三布告》为名，号召“向一小撮阶级敌人发动更加猛烈地进攻”。当日凌晨5时，支左部队和上万名武装民兵、“工人纠察队”、“联指”成员组织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按事先划分的地区，手持名单，挨家挨户搜查、抓捕，全市共抓了7000多人，仅有二千多师生员工的广西师范学院，就抓了1200多人。桂林地区所属12个县，在同一天行动，全地区抓了一万多人。“八二〇事件”和事件之后致使桂林市和桂林地区12个县枪杀、打死、逼死干部、群众一万多人。在“八二〇事件”后的一个月里，桂林市仅机关、工厂内部打死296人。桂林地直机关抓了300多人，大部分被杀害了。临桂县打死848人，仅县直驻桂林单位抓去318人，放了25人，其余293人全被杀害，其中发现一份111人的被杀害人员名单，名单里有县委副书记李瑾科、副县长周克仁、法院院长刘锡臣、副检察长龙炎运、县财贸政治部副主任李景发、县委办公室副主任王振廷等领导干部，他们被扣上“反共救国团”罪名，由县委宣传部干事、“联指”造反派头头胥明德以贯彻“七·三布告”的名义，于8月20日、31日、9月18日夜晩，用汽车拉到漓江边，除一人乘天黑混乱中逃跑外，其余110人全部杀害。仅有41名职工的县医院，杀死了16人。其中，县法院院长刘锡臣是“八二〇事件”时被抓，9月18日和其他4人在批斗时被活活打死，其妻是县医院的医生，8月23日同其他20人，被集体枪杀。就连跑回河北献县老家躲避灾难的17岁的儿子刘振刚，也被抓回打死，说“铲草不除根，以后是祸害”。刘锡臣夫妻和儿子被害后，遗留下一个15岁的女儿刘婵荣和两个幼子，生活无着，逼得15岁的女儿带着两个弟弟到处要饭。1981年5月，我们调查组到桂林调查时，她来找了我们，一边哭泣，泣不成声，一边控诉当时的暴行，在场的调查组的同志听了她的哭诉，禁不住凄然泪下。只有100余人的地区土产公司，杀害7人，该公司8月31日开批斗会，活活打死3人，让“4·22”成员谢定军、金声二人挖坑掩埋，坑挖好后，谢、金二人也被打死，一齐埋掉。9月13日上午，该公司接到上面不准再杀人的通知，下午又杀9人，其中，“4·22”成员吴若君因怀孕临产幸免，孩子生下后，起名叫“保驾臣”。当时“联指”杀人到了疯狂的程度。有一个从湖南到桂林搞副业的社员被盘问是干什么的，那人说：“打围的”，被当成打“韦”（国清）的，当场打死。

◇ 无所不用其极

抓起来的人没有被打死的，也遭到百般折磨。“联指”以桂林市革委会名义，在桂林广西师范学院搞了一个“‘4·22’反革命罪行展览”，第四展览室是“活人展览”，将抓起来的“4·22”成员，轮流囚禁在特制的木笼里，任凭参观者打骂凌辱。“八二〇事件”后，在桂林拥有10万群众的“4·22”组织，成了历史罪人，受到残酷镇压。无数被无辜杀害的干部、群众，被当成反革命来镇压，他们的家属也被当做“反属”或“被杀家属”，有些家住城镇的，被强行迁往农村。特别是那些父母双双被杀或父亡母改嫁的孤儿，生活极其悲惨。直到1974年才对被害人做了“非正常死亡，属人民内部矛盾”的结论，1979年又统一修改为“由于林彪、‘四人帮’极左路线的影响，于×年×月×日去世”的结论。

四、杀人手段骇人听闻

◇ 凶残狠毒

10年“文革”（广西可说是十六七年“文革”），广西不仅死人多，而且杀人手段之残忍、狠毒，骇人听闻。有砍头、棒打、活埋、石砸、水淹、开水浇灌、集体屠杀、剖腹、挖心、掏肝、割生殖器、零刀割、炸药炸、轮奸后捅死、绑在铁轨上让火车压死等等，无所不用其极。

柳州钢铁厂“联指”头目岑国荣（原为该厂工人，“文革”起来造反，当过中共九大、十大、十一大代表，是第九届中央候补委员，第十届中央委员，第十一届中央候补委员，担任过自治区工部主任、自治区党委常委）等人在该厂“4·22”成员黄日高（该厂人事科干部）的背

上绑上炸药，一按电钮，炸得黄骨肉横飞，还美其名曰“天女散花”，以此取乐。1968年，武宣县被分尸吃人肉、吃心肝的有38人，全县国家干部（包括原县委书记）、职工有113人吃过人肉、人心、人肝。贵县农民陈国荣路过武宣县去赶墟，因长得胖，被一民兵营副营长叫民兵把他活活杀害，挖出心肝，20人每人分了一块肉。女民兵班长陈文留，她一个人吃了6副人肝，还割下5名男人的生殖器泡酒喝，说是“大补”。这种吃人肉，挖心肝的暴行，武宣、武鸣、上思、贵县、钦州、桂平、凌云等县都有发生。

灵山县谭墟公社里屋大队侯国震解放前当过土匪杀过人，“文革”中参加“联指”，先后8次参加打砸抢杀，捉了6名教师，亲自打死了3人，取肝6副，卖了36元（后仅判刑10年）。贵县，1968年8月一次在南门外江边杀死十几人，全部被剖腹挖肝，由执行枪毙的刽子手炒吃下酒。该县思阳公社民兵营长黄必友，杀人后将胆取出晒干后当作熊胆出卖。

广西一些地方，出现了“贫下中农最高法庭”乱抓乱杀四类分子及其家属子女的严重事件。仅全州县的一个大队，两天内集体坑杀76人。由此造成成批乱杀人的局面，后果极其严重。如1968年10月初，全州县东山公社民兵营长黄天辉召集大队会议，商议决定召集民兵班、排长等30多个骨干开会。会上黄天辉说了湖南道县杀地、富情况，并提出：“我们也要动手，先下手为强”，“要铲草除根一扫光”。他还宣布：“不准通风报信，谁走漏消息就和地主一样。”最后采取坑杀的办法，强迫被害者跳坑，有的不愿跳，被黄用棍打后推下坑。地主出身的刘香云在坑口向黄求情，请求留一个小孩给贫农出身的妻子，说：“天辉，我两个仔，到政府去判也得留一个，我老婆也有一个，我抱一个跳下去，留一个给我老婆”。黄说：“不行”。结果，刘被迫抱着两个小孩（大的3岁，小的1岁）跳坑而死。1983年广西处理“文革”遗留问题时，黄天辉才被依法逮捕，于1985年1月被处决。

◇ 人性丧尽

梧州地区公安处一科副科长毛明日，“文革”中被诬陷，两次被逮捕关押，他的父亲和两个弟弟“文革”中被杀，其大弟毛明昭在一次群众大会上拉去枪杀时，他抱住一位军代表的腿，要求救他，那位军代表不理睬，还踢了他一脚，结果拉去枪杀了，还将他的头割下，挂在富川县城示众。1983年毛明日同志到南宁找到我们工作组哭诉，是我接待的他。

1968年柳州市在贯彻《七·三布告》时，中共柳州市委大院抓获35名干部、群众，然后将他们一个一个装入麻袋里，从市委后院推入柳江淹死。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协常委、区文史馆副馆长、民族史学家刘介，他四岁的小孙子玩耍时不慎将邻居蔡振华家的一条小狗从楼上掉下，“联指”小头目蔡振华以“打狗欺主”之名，伙同另一名“联指”成员申松华，将刘介一家祖孙三代四口全部杀死，同时还杀死了一名为此讲过几句公道话的人。

武鸣县华侨农场民涵分场的邓斯环，是伪保安团长邓文兴的侄子，解放后邓文兴等被政府镇压，“文革”中邓斯环参加了“联指”，乘机进行报复，以“反共救国团”罪名，抓了支部书记邓思凤等26人，其中活活打死、剖腹、割死的有7人。事后邓斯环对人说：“游击队能杀人，我们就不能吗？”崇左县锰矿党支部书记苏士林等3人来信反映：“1968年8月，‘联指’在全县进行大屠杀，一个晚上，太平镇就杀了24人。被杀者从家里捉起来，蒙上双眼，推上汽车，拉到县城外的半边山，一个一个用刀子捅死。哀号声、挣扎声、哭叫声，持续了一个多小时，吓得附近村庄，家家关门闭户，生怕大祸降临，这哪里是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比法西斯还不如”。

上思县革委会成立后，1968年9月1日县“三代会”在平山广场召开杀人大会，十多名参加“4·22”组织的干部、群众被活活打死。散会以后，县革委会委员黎郝，将打死的

十几名死者尸体，全部剖腹，将心肝挖出来，拿到县革委会食堂炒熟后给“三代会”代表下酒。南宁市徐振武的群众来信反映：“‘文革’期间，武宣、上思、灵山等县发生过吃人肉、吃人肝事件。武鸣县吃了29个人，副县长覃炳刚同志被打晕后，拉去开膛时，因人太瘦，周身无肉，又被拖出去丢在野外，遇救幸免”。上思县受害者家属来信反映：“《上思晚报》‘联指’头头黄元清等4人，将参加‘4·22’的女青年杨振明、刘吉芬抓起来，多次轮奸后杀害。（作者：晏乐斌 公安部退休干部）

□ 《炎黄春秋》2012年第11期。

~~~~~

## 【史海钩沉】

### 毛泽东的“老朋友”纪登奎

· 彭劲秀 ·

在中共党内，被毛泽东从基层破格提拔到中央重要职位上且显赫多年的人物并不多，纪登奎就是其中一个——他与毛泽东风云际会，在政坛上红了20多年，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受到批评，十一届五中全会批准他的辞职请求之后，才从政治舞台黯然退出。

#### ◇ 专列上的“六问六答”

1951年春天，毛泽东乘专列沿京广铁路南下视察，途经许昌时停车听取许昌地区负责人的工作汇报。这是时任地委副书记兼宣传部长的纪登奎第一次见毛泽东。在专列上，纪登奎扼要地介绍了许昌地区的历史文化、乡土风情、资源物产等概况，汇报了土改、治淮、抗美援朝、农业生产和宣传等方面的工作。

汇报结束时，毛泽东突然问他：“你挨过整吗？”纪回答：“挨过，挨过两次。”

毛泽东说：“我挨过三次，比你多一次。”并说“挨点整，有好处。”接着提出二问：“人家整你，是整对了，还是整错了？”

纪说：“整错了。两次都整错了。”并简略叙述了自己在冀鲁豫两次挨整的经过。

毛泽东三问：“那么，你整过人么？”纪坦诚地回答：“整过。整人比我挨整要多。”

毛泽东四问：“整错过没有？”纪说：“有，也整错过。”

毛泽东突然又严肃地第五次发问：“你杀过人吗？”纪登奎一怔，随即答道：“杀过人。剿匪，反霸，镇压反革命，杀了不少人。”

毛泽东第六次发问：“杀错过人吗？”纪答道：“也有杀错的。”并解释说“那是在情况紧急时发生的，没有来得及做调查就把人杀了”。随即检讨：“是我的工作没有做好。”

毛泽东连续发出的六问，看似闲谈，实则是对纪登奎的经历、水平、胆识、人品等诸多方面进行的一次多方位、深层次的考察和面试。面对毛泽东的六问，纪登奎没有张口结舌，没有刻意回避，没有顾左右而言他，更没有假言蒙骗，而是在总体上做了实事求是的回答，毛泽东甚为满意。

毛泽东离开许昌到了武汉，他要中南局负责人王任重派人调查、总结许昌地区宣传工作的经验。王任重找来中南局宣传部宣传处长郭小川，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要他去完成这个任务。郭小川马上到许昌调查，很快写出《中共许昌地委宣传工作》一文，在1951年4月29日《人民日报》上发表。同日的《人民日报》还发表了《学习许昌地区经验，做好党的宣传工作》的社论。这样一来，许昌地区的宣传工作引起全国的关注。5月，纪登奎应邀参加了全国第一

次宣传工作会议，并向与会代表介绍了许昌地区宣传工作的经验。毛泽东称赞道：“我党的宣传工作有了新的发展。”会议结束不久，年仅28岁的纪登奎被任命为中共许昌地委书记。

此后一直到“文革”前，毛泽东到河南十多次。每次去，毛都要把纪登奎找来，听他汇报。由于毛的赏识和信任，也由于纪登奎的工作出色，到“文革”开始时，纪登奎的职务已是中共河南省委书记处候补书记兼省委秘书长了。不久他又被提拔到中央，一再委以重任——这一切，都起源于专列上的成功“面试”。

#### ◇ “老朋友”的来历

毛泽东生于1893年，比生于1923年的纪登奎整整大30岁，应该说属于两辈人。然而，毛泽东却公开称纪登奎为“老朋友”，从此，“老朋友”就成了纪登奎的外号。这在中共党内极为少见。这个外号源于1967年，地点不是许昌，而是郑州。在“文革”的高潮中，1967年9月22日，毛泽东在从南方返回北京的途中，经过郑州时稍作停留，河南省党政军负责人刘建勋、王新、纪登奎应召登上毛泽东的专列。毛泽东见到纪登奎，高兴地握着他的手说：“纪登奎，老朋友啦！”这就是毛泽东第一次称纪登奎为“老朋友”。

毛泽东第二次称纪登奎为“老朋友”，是在中共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主席台上。1969年4月，纪登奎出席了中共九大。4月14日，毛泽东主持第二次全体会议。会议首先通过了政治报告和新党章，然后是大会发言，先后有周恩来、陈伯达、康生、黄永胜、王洪文、陈永贵、孙玉国、尉凤英、纪登奎9人发言。轮到纪登奎发言时，毛泽东扭头往身后的主席团成员席上扫视，没有看到纪登奎，于是问身旁的周恩来：纪登奎同志在哪里呢？周恩来指着前面的代表席，说：纪登奎同志在下面。这时，纪登奎从代表席上站起身，走向主席台发言席，当他走到毛泽东面前时，毛微笑道：请你讲话。然后，毛泽东向大会全体代表说：他叫纪登奎，是我的老朋友，山西人，长期在河南工作。

听到毛泽东的公开介绍，容纳1512名代表的会场顿时响起雷鸣般的掌声。在这次大会上，纪登奎当选为中央委员。在九届一中全会上，经毛泽东提议，纪登奎又成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显然，“老朋友”的称呼发挥了极大的作用。

#### ◇ 缘何获得赏识？

回到列车上的召见。据纪登奎晚年回忆，这样的召见有13次之多。不少人据此认为纪之所以获得毛的赏识，主要是由于纪幸运地到了专列。但是，光有机遇显然不够。毛泽东在河南曾同时召见纪登奎和路宪文，但两人的表现和结果迥然不同——“大跃进”期间，毛泽东南下的专列从郑州开向信阳，信阳地委书记路宪文也曾应召登车汇报工作，但他总是说不到点子上。毛泽东兴味索然，很快就让他下车。而这时本该下车的许昌地委书记纪登奎，毛却不让他下车。路宪文事后埋怨办公室的秘书们“不会弄材料，还是人家老纪会说，毛主席听得不让走”。

原来，毛泽东问路宪文：你所管辖的地方既然有一个上蔡县，理当还有一个下蔡喽？路宪文紧张地说：报告毛主席，我学习得不好，不知道有没有下蔡。毛泽东又问：你那个信阳市里，宋士杰告状的文庙还在不在？路宪文又赶紧答道：报告毛主席，我学习得不好，不知道。毛泽东说，好了，你谈谈工作吧！路宪文就赶紧汇报说怎么发动群众，怎么发明创造，过去蒸着吃的红薯，现在可以蒸馍馍、包饺子、做点心……毛泽东终于不耐烦地说：你说了半天，不就是一块红薯么？！

后来，地委秘书们告诉路宪文：新蔡建县时间晚于上蔡，地势较低，应该就是“下蔡”了；

地委办公室后面的老古董房子，就是过去的文庙。路宪文恼羞成怒地说：你们给我准备的材料上有这些吗？就是这个路宪文，在担任信阳地委书记期间，急功近利，虚报浮夸，在1959年闹出了震惊中外、饿死百万民众的“信阳事件”，被撤职查办，落了个身败名裂。

纪登奎就完全不同了。他工作比较深入、务实，掌握实际情况，善于搞群众运动。早在1943年4月，冀鲁豫边区党委书记黄敬主持召开大会，总结几个月来的群众运动。会议期间，二地委向黄敬汇报了纪登奎在鄆北搞群众运动的做法，引起了黄敬的重视。他当即派人通知纪登奎参加会议，并要他在大会上介绍经验。纪登奎从访贫问苦、同吃同住、扎根串连、申冤诉苦，讲到建立农会、成立支部、民选村长、整顿民兵、分半减息、二五减租，等等，讲得有条有理，头头是道。与会听众称誉他为冀鲁豫边区的“群运专家”。会后，边区各地县纷纷派人到鄆北参观学习。黄敬对纪登奎倍加重视，经常通知这位年仅20岁的小伙子参加区党委的有关重要会议。

在“大跃进”运动中，各地争先恐后地“放卫星”，虚报浮夸盛行，造成严重后果。1959年庐山会议后，全国开展反右倾运动，使“大跃进”中的错误更加严重。纪登奎害怕把农村搞乱，但又顶不住上面的压力，在不得不贯彻上级指示、集中各级干部开动员大会时，他采取迟迟不散会的办法，以延缓反右倾会议的精神传达到基层。

“大跃进”期间，仅信阳一地非正常死亡就逾百万，而洛阳地区基本上没有饿死人的现象。1960年冬天，在河南考察的陈云听说这个情况，问纪登奎这是怎么回事。纪登奎说，我这个办法叫两本账，上边布置那个往下压的高指标、高征购啊，我没有办法，我也接收，但是我得弄清楚实际情况，这是另一本账。我得安排群众生活啊。

除了工作实力，更重要的是纪登奎往往能准确地按毛的心理和思想回答问题。如1967年9月22日的专列召见。当时正是“文革”高潮，几乎所有的领导干部都受到冲击，纪登奎也不例外。刘建勋对毛泽东说：登奎同志在河南可受锻炼了，他在运动中被关了四个多月，挨批斗，坐“喷气式飞机”……

毛泽东看着纪登奎说：啊，真是多灾多难。你说，这一点好处都没有吗？此时，精明过人的纪登奎没有大诉其苦，发泄不满，而是颇为轻松地说：大有好处，能够锻炼人。

毛泽东问：你挨了多少次斗？坐“喷气式飞机”是什么样子？纪登奎回答说：挨斗不少，有几百次。坐“喷气式飞机”就跟割麦子差不多，还可以锻炼身体呢！毛泽东听了哈哈大笑。他从椅子上站起身，学着坐“喷气式飞机”的样子，弯腰，低头，把两只胳膊朝身后高高抬起，大家见状都笑了起来。这样的气氛，在毛和下属的谈话经验里，应当是不多见的，也是受欢迎的吧。

#### ◇ 与张爱萍当面冲突

纪登奎虽然在“文革”初期受到冲击，挨批斗，但很快就被结合进河南省革命委员会任副主任。被提拔到中央担任重要职务后，他就一直是“文革”中的“红人”。位高权重的纪登奎跟着“文革”犯错误、说错话、做错事、伤害人，可以说是必然的。

据张爱萍将军的儿子张胜写的《从战争中走来》（中国青年出版社2008年版）披露，1975年3月，经过叶帅的反复动员，张爱萍重新回到国防科委系统，重点整顿230厂。他兴奋地对孩子们说：“邓小平出来了，说明毛主席回心转意了。”这是他出山的前提。其实，张爱萍判断错了。毛并没有回心转意，他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这样，重新工作

后狠抓整顿的张爱萍必然在劫难逃。

1975年11月2日，被张爱萍赶出七机部的造反派头头舒龙山揭发张爱萍的告状信递到了毛泽东案头。毛批示：“印发政治局各位同志，请总政酌处。此人是9·16左派。”对张爱萍的问题，总政当然“酌处”不了。于是，由华国锋出面主持，李先念、纪登奎、陈锡联等大员召见张爱萍。规格如此之高，连国防科委政委陶鲁笏也只能“奉陪末座”。从张胜抄录的会议记录看，张爱萍的态度仍很强硬，不仅没有认错的意思，而且与纪登奎当面发生了冲突。

纪登奎：我问你，“今不如昔”这句话是什么人说的？张爱萍：是右派说的。

纪登奎：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张爱萍：还用解释吗？告状的人不是左派吗？

纪登奎：那你到底说了没有？张爱萍：还用我说吗？七机部的问题你不清楚？

纪登奎：你看看你，讲的话就有这么厚厚一大摞！张爱萍：你都看过了？没有看到你自己讲过的话吗？

纪登奎：你什么意思？张爱萍：“九年无宁日”，就是你说的。忘记了？

纪登奎：你血口喷人！态度很不老实！

陈锡联用腿碰碰张爱萍，悄声说：“你承认了算了。”张爱萍大声问：“你们要我承认什么？”陈锡联：“承认犯了路线错误啊。我不也承认过嘛，也没有把我怎么样嘛！”张爱萍大吼：“那是你！”

主持人华国锋觉得会议开不下去了，宣布：“这件事很突然，对毛主席的指示需要一个理解和认识的过程。是不是请爱萍同志回去再想一想。就散了吧！”

张爱萍事后说：“华国锋替我解了围。”

张胜在书中写道：“张爱萍解释他当时的激愤心态：‘只是有些人品格太差，还坐在这样高的位置。’”纪登奎的儿子曾写文章为父亲叫屈。其实，“文革”结束了，纪登奎不下来，还能站得住吗？张爱萍比纪登奎大13岁，为革命出生入死，戎马一生，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纪登奎对这样一位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现代国防科技建设领导人上纲上线，后来又要张爱萍在批判大会上检讨，显然是错误的、不明智的。

#### ◇ 十一届三中全会上老干部的严厉批评

粉碎“四人帮”后，在“文革”中蒙受冤屈和迫害的老干部对纪登奎不满，是非常正常的。在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不少历经沧桑、劫后余生的老干部都对纪登奎展开了公开的批评——

万里说：活着的个别领导人干了错事坏事，必须自我批评，不要欠账。吕正操说：你指的是纪登奎，说明白点。万里说：对，就是指他。江一真说：纪登奎在1970年农林部成立时指出，要把农林部办成农林政治部，又对农科院军宣队指示：“科研是依靠7500人还是依靠7.5亿人？”纪还说“大学4年没有招生，卫星照样上天，农业还是丰收”。今年4月他还指示农林部给中央报告，认为当前主要倾向是对资产阶级法权批得不够。这次会议前，他又派人去安徽调查包产到户和学大寨动摇的问题。段君毅说：群众反映河南问题在上边，上边就是指纪登奎。“四人帮”倒台后，纪给造反派通气，让他们表态，河南人说“心有余悸（纪）”。

许世友的发言更加尖锐：你是造反起家，进了政治局，官不小了，还搞什么名堂，你基本是跟“四人帮”走的。

邓颖超也不客气地批评说：你的检讨很坏，避重就轻，应把10年来在政治、思想、工作、作风、立场上与“四人帮”是什么关系说清楚。建议中央也要查清，一批二保三看。有同志说你是翻云覆雨的政客，你今后还是政治局委员，希望警惕，不要利用权位报复我们。

廖承志说：外交部有反总理、反陈老总的逆流，捂盖子，有你的账，而且是相当大的账。程子华说：十一届一中全会，我揭发了纪登奎等人，没出简报。前几天，我批纪的简报又有好几天没出，我问简报组，说是送主席、副主席传阅去了。建议给华主席写一个报告，这样做叫什么民主。

谭震林、陈漫远、姚依林等也都作了发言。出席三中全会的许多人都给纪登奎提了意见，有的意见还相当尖锐。纪登奎表示接受大家的批评，并做了检讨。

值得一提的是，在这些对纪登奎提出批评的老干部中，万里、段君毅都曾在冀鲁豫边区时期担任过地委书记，是纪登奎的老领导，对他都有过支持和帮助。在三中全会上，他们对纪登奎不仅当面提出批评，而且措辞颇为严厉，说明在“文革”中，位高权重的纪登奎没能正确对待受难中的老领导、老干部，他们对纪登奎是很有意见的。

#### ◇ 与“四人帮”之间：追随和矛盾

人所共知，“文革”中“四人帮”不可一世。作为“文革”中的“红人”，纪登奎不可能超然物外，他与“四人帮”必然存在某些联系，乃至追随。正因如此，许世友甚至说纪登奎是“造反起家”，“基本是跟‘四人帮’走的”。

据《话说纪登奎》（《贵阳文史》2008年第5期）披露，毛泽东在点名批评“四人帮”的同时，说过这样的话：“登奎有的事不和我讲，也不和总理讲，却是找江青、春桥讲，政治局大多数，他都不讲，不团结多数，只找少数人，这是什么性质呢？一个政治局委员要和政治局，要和党中央保持一致，而不是和几个人保持一致。”毛泽东的这段话说明纪登奎对“四人帮”确实有所追随。

毛泽东虽然批评了纪登奎，但对他仍是信任的。纪登奎对主席的指示也仍是坚定不移地执行的。如1976年3月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批邓”时，纪登奎说：“小平同志是旧病复发，没有吸取1966年的教训，没有按照毛主席的意见抓好革命的方方面面，而是继续和那些死不悔改的走资派纠缠不清，以后，小平的问题升级了，也是由此而来的。”

纪登奎虽然有时紧跟“四人帮”，但和他们还是保持了相当的距离，特别是华国锋被确定为接班人后，纪登奎表示拥护。在讨论毛远新的去留和江青的具体工作安排上，他支持了华国锋，以致江青等人恨恨地说：“真是人走茶凉，主席尸骨未寒，连纪登奎都敢和我们顶嘴了。”

纪登奎在思想、品德、性格、作风等方面与“四人帮”确实有不同之处，后来“四人帮”也把纪登奎视为异己，有时不仅排斥他，甚至诬陷他。所以，有人说“纪登奎与‘四人帮’不是一路人”，此话是有一定道理的。正因为如此，在某些问题上，纪登奎与“四人帮”产生了一些矛盾。1974年，紧随“四人帮”的迟群和谢静宜在清华大学“批林批孔”大会上讲话时，除讲了“批林批孔”，还强调批“走后门”问题，后来被毛泽东批评为“三箭齐发”。时任校党委书记刘冰不赞成这个讲话，同时对迟、谢二人的一些不良作风不满，矛盾很深。

纪登奎的一个女儿在清华大学上学，她关心政治，觉得迟、谢的讲话与中央的8号文件有

所不同，回家后就把迟、谢的讲话内容向纪登奎说了，还问纪登奎：迟群、谢静宜的讲话和中央8号文件，哪个对？纪登奎立即明确表态：迟、谢的讲话是错误的。他还告诉女儿：江青等人搞“三箭齐发”，毛主席已经批评。当时中央政治局开会要求将毛主席的批示下发，但江青、张春桥提出要保护青年干部，文件不下发，只在中央8号文件中“点一下这个事”。纪登奎的女儿回学校后，把父亲说的话告诉了刘冰。刘冰与迟、谢二人斗争的信心更足了。后来毛泽东批了刘冰，并由此发起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纪登奎虽然侥幸没有挨批，但“四人帮”与他的矛盾进一步加剧了，甚至对纪登奎横加诬陷。

吴德1993年在回忆中说：“1975年根据毛主席的指示，邓小平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批评‘四人帮’。从那以后，毛主席就很少见江青了。为了摸毛主席的情况，江青就不惜屈尊拉拢毛主席的秘书张玉凤，给张玉凤送礼，把张玉凤请到钓鱼台吃饭。席间，动不动就对人兴师问罪的江青，竟忘乎所以地议论起政治局的同志，她对张玉凤说：纪登奎是苏联特务，汪东兴是个大特务，吴德是国民党。”“张玉凤回来就把江青的这些话向汪东兴汇报了，她请示是否把江青的话上报毛主席。汪东兴说这个事情不要汇报，有关中央负责同志的情况，不要听江青乱讲。”“对于这件事，汪东兴曾经向我谈过，提醒我注意。”江青公然诬陷纪登奎是“苏联特务”，这个“帽子”的性质和后果是不言而喻的。这反映了江青对纪登奎的怨恨。纪登奎听到这个情况后，与江青的矛盾自然进一步加剧。

1976年7月，毛泽东的病情加重，“四人帮”加快了篡党夺权的步伐。由于纪登奎长期担任河南省领导职务，到中央后又兼任一段时间的中共河南省委书记，所以他与河南省委的干部常有接触。纪登奎曾通过一定的渠道和方式向河南省委的领导干部打招呼，让他们注意“四人帮”，与“四人帮”划清界限。1976年10月6日晚10点多钟，中央政治局在玉泉山叶剑英住地开会。华国锋、叶剑英通报了抓捕“四人帮”的情况。大家发言时，纪登奎表示坚决拥护中央的这个决定。

尽管犯了某些“文革”错误，伤害了一些老干部的感情，但纪登奎有时也冒着风险为老干部说几句公道话，甚至向毛泽东坦诚地提出自己的建议。

#### ◇ 在毛泽东面前的一次“唱反调”

1980年春，纪登奎已受到批评，做了检讨，并辞去了党和国家的领导职务。就在纪赋闲在家、门可罗雀时，已获平反的李雪峰登门拜望。李雪峰见到纪登奎，第一句话是：“纪登奎啊，你好大的胆子哟，竟然敢在毛主席面前唱反调！”纪登奎如何“胆大”？唱了什么“反调”？

据纪登奎的儿子纪坡民《回忆李雪峰和我父亲的一段往事》（《党史博览》2008年第5期）披露，“文革”前，李雪峰是中共中央华北局第一书记，是党的高级干部。1966年5月，“文革”正式开始了，6月1日，中央宣布李雪峰取代彭真接任北京市委第一书记。李雪峰一度成为政治明星。“这意味着他是毛主席和党中央非常信任的干部，用那时的话来说，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可是不久，李雪峰卷进“路线错误”之中。当时，毛泽东对他还是眷顾的，所以李雪峰虽离开了北京，但几经折腾，仍被“结合”为河北省革命委员会主任。

九届一中全会上，纪登奎当选为政治局候补委员。此时，李雪峰正面临着一场“灭顶之灾”。在1970年的庐山会议上，发生了所谓“华北组简报”事件。当时，陈伯达在华北组发表煽动性的讲话。作为华北组的召集人，李雪峰签发了华北组记录会议发言的“简报”。这本来是正常的工作，但两天半之后，“华北组简报”一下子成了严重问题。而且“上纲上线”说这不仅是一个“错误”，而且是“反革命简报”。于是，李雪峰又一次陷身政治斗争的漩涡。

针对林彪集团，毛泽东采取“甩石头”、“掺沙子”、“挖墙脚”的“三大措施”，展开检举、揭发、批判、追查“华北会议”的问题，最后撤销了李雪峰、郑维山北京军区政委、司令员的职务，改组了北京军区。从此，李雪峰开始了他长达8年的牢狱之灾。

庐山会议后纪登奎更受重用，中央任命他和李德生分别取代李雪峰、郑维山担任北京军区政委、司令员职务。“九一三”事件后，纪登奎参加了对“林彪反党集团”的专案审查，李雪峰的问题自然归他管。1973年党的十大前，林彪的专案审查工作结案，纪登奎和周总理、叶帅一道去向毛主席汇报。在谈到林彪事件涉案人员的处理意见时，纪登奎向毛主席提议：“李雪峰、郑维山两位，同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四位大将的问题不一样，处理上也应当有区别，建议不要开除党籍了。”

毛泽东听后，高深莫测地说：“纪登奎呀，你这个人啊，少两根白头发。不像我们这些人。”纪登奎曾给儿子解释说，毛主席这个话，听起来好像是开玩笑，实际上是批评他阅历太少，政治上幼稚、不成熟。而且，这番话，也就表示毛主席驳回了他的提议。就这样，李雪峰和黄、吴、李、邱一起，被开除了党籍。

也有资料说，十大前夕，毛泽东提出把李雪峰当作林彪的同伙处理，政治局讨论时认为不妥，建议周恩来去向毛泽东反映，周恩来建议纪登奎去。纪登奎反映后，毛泽东表示不屑再考虑，只说“不能原谅他”，坚持将李雪峰开除出党。

纪登奎的建议未被采纳，但后来听说了此事的李雪峰仍心存感激。当一个人在蒙冤负屈的困境中，人们纷纷远避甚至落井下石的时刻，有人敢于说一句公道话，这是非常难得的。李雪峰的登门造访，无疑使冷落在家的纪登奎感到欣慰。对当初李雪峰获罪的“华北组简报”，纪登奎说：“是啊，如果大家的发言讲的是对的、革命的，‘简报’自然不是反革命；如果他们的发言是反革命的，那么‘简报’就等于向中央检举了他们的反革命活动嘛，怎么会是‘反革命简报’呢？”

然而，纪登奎这番实事求是的话只是他后来回首往事时的“自言自语”。如果当时他敢于在毛泽东面前如此直抒己见，结局可能就完全不同了。

1970年9月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后，毛、林矛盾加剧，林的接班人地位发生动摇。毛泽东在与林彪的一次谈话中明确提出：要培养接班人，我们都是60岁以上的人了，要培养60岁以下、30岁以上的人。像李德生、纪登奎等人。这说明，毛泽东在考虑下一步由谁来接替林彪接班人地位时，确实曾将纪登奎纳入视线——当然，毛泽东最终选定的接班人是华国锋。

1988年7月13日，纪登奎因病在北京去世，享年65岁。纪登奎的一生，折射出建国后20多年间中国政治舞台的风云变幻，其进退沉浮的传奇经历，让人至今思来仍感慨不已。

（作者系文史学者）

□ 《同舟共进》2012年第11期

~~~~~

【文革一页】

我在“文革”专案组的日子

• 徐兆淮 •

◇ 以非党员身份进入专案组

我是出身贫寒人家的平民子弟，1964年大学毕业分配到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文学研究所，两年后“文革”爆发。“文革”前，我从未接触过专案一类的工作，一向以为那是党的组织部门和公安部门所主管之事。“文革”以降，造反行动打乱了一切原有的秩序与纪律，推翻了一切原有的结论，于是，我这样连党员都不是的人，也有了参与专案审查的机会。然而，“文革”中的专案组在打破原有秩序的同时，代之而起的，却是践踏人权、无法无天和几近混乱无序的无政府主义状态。

那时的所谓专案工作，或者借炒冷饭抓历史问题，或者借现行言论制造新的冤假错案。结果，发动全所百十号人耗费十年时光，到头来并未抓出几个历史与现行的货真价实的所谓反革命。

学部和文学所的“文革”运动，自1967年前后出现两派群众组织的对立之后，几乎就进入了一种无政府的状态中。如果说，这时期两派群众组织之间互相搜集、整理对立派的所谓材料，上报中央文革和国务院，根本就不能称之为搞专案或成立专案组，那么，1968年底，自从工、军宣队派驻学部之后，部署清理阶级队伍时，文学所成立的清队专案组，便可算是真正的“文革”专案组了。

主管专案的工宣队领导是首都二轨钢厂的赵博师傅，他穿着当时流行的工作服，胖墩墩的身材，说话慢声细语的，不像军宣队的薛队长那样咋咋呼呼。

进专案组之前，我属于红卫兵总队文学所勤务组成员，曾参与过总队总部对“5·16”反革命集团的部分审查工作，看守过被隔离审查的涂××，至今，我也未弄清军宣队把我调进专案组，究竟是因为出身贫寒，年轻单纯，还是因为我在群众组织里参与清查过“5·16”兵团的工作。

自1968年至1972年期间，据我所知，专案组审查事项大体有如下三类：一是翻老账查历史问题；二是清理解放后至“文革”前现实言论或文章；三是查“文革”中的“5·16”反革命集团案。在清理阶级队伍的含义之下，真可谓把文学所从历史到现实都翻了个底朝天，直到“文革”结束之后，这才发现这一切都不过是子虚乌有的瞎折腾！

◇ 捕风捉影查影射

查现实言论，追影射文章，是专案组的一项重要工作。“文革”时期，在知识分子成堆的学部，大字报大批判铺天盖地，揭发黑线人物，反动学术权威的种种罪行，除了解放前的所谓历史问题，便是解放后的现实言论和反党文章了。在我经手清查的现实言论中，主要是有关钱钟书的两句言论：一是有人揭发钱在《毛选》英译委员会工作期间，曾有恶毒攻击《毛选》英译工作的言行；二是与友人议论厨房政治的错误言论。这在“文革”初期，前者可归于恶攻范畴，罪当处死，后者则可定为反动言论。但在1969年“文革”中期，毕竟头脑冷静了些，在最终讨论、写审查结论时，我以孤证为由推翻了前条言论，只对后条作了“错误言论”的结论。当然，如果用今天的眼光看，连“错误言论”也很难扯得上。

另一件被当作影射文学代表作品的，是陈翔鹤和他的《陶渊明写挽歌》《广陵散》。早在1965年11月份，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开创大搞影射文学，随后又迫害吴晗至死之后，清查影射文学之风，便在全国愈刮愈猛。陈翔鹤在文学所旋即遭到猛烈的批斗。

待到工、军宣队进驻学部之后，也一直紧追不舍，多次组织批斗会，逼迫陈承认影射之罪。陈年近六旬，且患有心血管病，连遭批斗无法入睡，遂多服了几粒安眠药而猝死，结果被军宣队宣布为自杀身亡。事过多年之后，我曾写过一篇《陈翔鹤之死》追记此事，表达哀思。

◇ 子虚乌有的“5·16”

在十年“文革”中，在整个学部，历时最久、牵连最广、最为复杂的现行案件，莫过于清查“5·16”反革命集团。我在文学所“文革”专案组耗费时间最长、投入精力最大，又最让人头疼费心的，也正是清查“5·16”案件。尽管此事逝去了四十多年，尽管其间我也不断地查阅披露出来的有关资料，但我至今仍然不甚了了，说不清楚这一案件的来龙去脉，也解不开弥漫在眼前的种种谜团。

早在1967年底前后，工、军宣队进驻学院前，我即参与过红卫兵总队清查“5·16”兵团的部分专案工作。当时在沙滩法学所就隔离审查过文学所涂××，外文所兴××。因为在此前审查学部资料室冯××时还出过人命，所以，我们在审查涂、兴时再也没有发生过严刑逼供的情况。据说，学部“5·16”兵团是“5·16”反动组织的据点和大本营，而“5·16”兵团又是与社会上反周总理的思潮紧密相连的，因而，清查“5·16”运动从一开始，便与受到中央文革王关戚所支持的学部“兵联队”纠缠在一起，难以分离。联队的头头们首先遭到隔离审查，随即将材料报送中央有关方面。时至今日，我还闹不清是学部红卫兵总队的上报材料误导了中央的决策，还是中央的决策引发了学部的清查运动。

当然真正把清查“5·16”运动推向全国的，乃是姚文元的《评陶铸的两本书》和1970年3月中央20号文件。正是在这些事件的推动下，学部工、军宣队才积极组织专案力量，加强对“5·16”反革命集团的清查。在这段时日里，我与其他专案组人员，深信中央文件的正确性，从未怀疑“5·16”兵团是否真正在学部存在过。而且就我所知，这并不是我个人的混沌，也可说是大多数知识分子陷于个人迷信的结果。

在清查文学所“5·16”分子过程中，我先是负责王春元的专案。同时受到清查的还有涂××、张某、杜某、钱某等人。据学部“5·16”兵团的某些人交代，文学所有个“5·16”分队，以上便是分队骨干。实际上，这一名单大体包揽了红卫兵联队文学所的骨干力量。用如今的眼光看，也许这一名单未免过于庞大，让人生疑，但在当时，因为有中央文件作根据，加之学部长期以来激烈的两派斗争所积聚的派性和复仇心理作怪，也就并不十分生疑了。

按照清查“5·16”的中央文件规定，既然“5·16”兵团是一个反革命集团，那么清查运动便迅速升格为对敌斗争，于是，在各种名目的学习班的名义下，严厉训斥、威逼与恐吓，便也不可避免，车轮战式的疲劳轰炸更是家常便饭，《敦促杜聿明投降书》等语录往往成了敲打人的武器。在长时间的疲劳轰炸之下，年过五十的王春元倒也能沉得住气，依旧能态度和蔼地与我们周旋，从来没有乱招乱供的现象。我和王春元之间也未出现你死我活的紧张态势。倒是连日的疲劳轰炸，让我也有些体力不支了，有一夜晚遂抽空找个安静处所小憩了一两个小时，未料想此举竟遭到军宣队一小战士的严厉批评，说是清查“5·16”是一场对敌斗争，你擅离战场便是犯了临阵脱逃的错误。我内心不服，却又无法为自己辩护。

大约在1970年前后，学部清查“5·16”运动在河南“五七”干校持续一年之后，终于发生了一些变化，不知是清查运动本身的问题，还是因为上层政治斗争出现新情况的缘故，清查运动呈现出疲软状态。我等参与清查者已开始怀疑“5·16”兵团是否真正存在过，盖因被审查者的交代大都不一致，甚至前后矛盾，而且我已逐渐意识到，即使有这一组织，其一般成员也未必都是敌我矛盾，其性质就如同已放下枪的国民党士兵一样。

促使我产生怀疑“5·16”真实性的另一因素是，就连我自己也被怀疑是“5·16”第二套班子成员了。我自然深知自己并未参加过这类组织，我的同派战友也不会参加的。于是，我对军宣队领导保证说：我不是“5·16”，我的朋友何文轩、王保生、许志英、王信等也不可能是。此时，我与一些可以信赖的朋友常聚在一起议论清查“5·16”运动形势，并逐渐取得了一致意见：不相信文学所“5·16”集团的存在，更不能用对待敌我矛盾的方式来看待被审查者。尤其是在干校繁重的体力劳动中，我们从不借机整他们，让他们吃暗亏。虽然，我等的这种态度曾被某些人称为是右倾机会主义的“鸡派”立场，但改善了清查者与被审查者的紧张关系。以至，多年之后，我们与王春元、杜书瀛等都成了不打不相识的朋友。直到我调离北京，偶尔回京，我仍不忘去看望王春元。

较之王春元，另一审查对象张某则有很大的不同。王春元沉静内向，为人处世冷静随和，从不张扬激烈状。而张某则显得慷慨激昂，热情外露。写文章洋洋洒洒，文笔流畅，辩论起来口若悬河，滔滔不绝。在被审查期间的强大压力之下，张常情感激动地痛哭流涕，写交代材料则下笔千言万语，如泉水般汨汨流淌。至于是否真实可信，就连我等专案组的人，也往往疑窦丛生。

在学部清查“5·16”运动中，据我所知，学术资料室曾有冯宝岁被逼供而亡，宗教所也有人上吊而死。文学所并无严刑逼供，致人死亡的案例。只听说杜某曾有自杀念头，钱某则整日紧锁眉头。但是，整个清查运动从明港返回北京之后，已经基本停下来。随着林彪的垮台，肖、杨、余、傅逐渐解禁直至最后平反，实际上，人们已不再相信“5·16”兵团的存在了，尽管还有人指责清查“5·16”运动犯了“一风吹”的错误，但在学部大多数人心里，已经为历时多年、波及甚广的清查运动平反了。

◇ 专案组内种种

“文革”中工、军宣队主持的专案组，既不同于群众组织和造反派组成的专案组，也不同于“文革”前人事单位的审查，或公安系统组成的专案审查。比之“文革”期间造反组织之专案的狂暴性，虽说有些减弱，但终究还是无法规可言的。专案水平如何，则在很大程度上，要取决于专案人员的良知与素质了。

专案组组长马某“文革”前原所里共青团书记，“文革”造反初期思想偏于保守，运动中期一直是游离于运动中心的逍遥派，工、军宣队进驻学部后，被任命为专案组负责人。他平常为人沉稳，但城府很深，颇受上级重视。专案组下干校后辟有一间办公室，我与他同住一屋，后来专案组要抓“5·16”二套班子，牵涉到我与何文轩、王保生等人，马某口风甚严，特让新调来杨某、肖某两位掌管专案材料。我虽心知肚明，却也不便为自己申辩。

专案组还有两位老干部，一位是文学所原人事科长高某（女），她50岁左右，一向口风甚严，与组长配合很好，颇受信任。而另一位老干部朱寨，则是一位十分喜爱文学评论和创作的文学工作者，他人年轻时即奔赴延安，曾参加过延安文艺座谈会和延安的抢救失足者运动。耿直的朱在“文革”狂飙初起时，即曾提醒我等年轻人不要狂热处事，当即招致猛烈的批斗。后来，他在北京专案组期间，因陪同宣传队赴南方出差时的一桩小事，再次受到批判，随后便离开了专案组。

我在“文革”专案组大约呆了三年多的时光，1972年下半年学部干校结束，我等干校人员全部返回北京。专案工作陷入了停顿间歇期，在无事可做无书可读的情况下，我们除了在清谈闲聊中打发时光，便热衷于打家具和打乒乓球。随后，我离开了文学所离开了专案组，调回江苏工作。

“文革”之中，本来就不乏翻老账追现行的事例，对刘少奇的“叛徒、内奸、工贼”的结论是如此，对“61人”所谓叛徒集团，还有对瞿秋白《多余的话》的追究，都是典型事例。在文学所对历史问题的专案清查中，清查过孙楷第、俞平伯、陈友琴、王云荪等人的所谓历史问题，清算过唐|游走于中间道路上，在中性刊物上发表文章的所谓罪行。其实，作为老辈知识分子为了生存，又有多少人没在旧社会谋事就业养家糊口？又有多少人没在旧报刊上发过文章？对这些如今已是人人皆知的浅显道理，在“文革”初期，我等青年知识分子竟被各种革命口号所蛊惑，失去自己的判断能力，视之为严重的历史问题而予以追究、批斗。如今来说，所有这些历史问题自然不值一提了。值得深思的倒是，我们这些受过高等教育的中青年知识分子，为何那么易于受欺骗、蛊惑，而失去了起码的判断能力？我们是埋怨导演者，还是责怪我们自己？

□ 《炎黄春秋》2012年第4期

~~~~~

### 【人物追踪】

李讷在“文革”初期

· 阎长贵 · 王广宇 ·

多年来，有许多书籍和文章谈到李讷，内容包括她的学历、工作经历、婚姻情况等等，其中不少在叙述史实方面不准确。我们作为她在“文革”初期的同事，对她有所了解，看到有关她的史实错讹，很是不忍和不满，如鲠在喉，觉得有责任做些澄清，以免以讹传讹，积非成是。

不少人说，李讷1966年从北京大学历史系毕业，不对。李讷是1965年毕业。她1959年考入北京大学历史系，学制5年，本来应该1964年毕业，中间因病休学一年，所以，她于1965年毕业。

错讹最厉害并流布最广的是李讷大学毕业后的工作经历。造成这个错讹的始作俑者是谁？我们没有确考，觉得仿佛上海徐景贤说得较早。他的《十年一梦》中说：

1965年夏，李讷从北京大学毕业，被分配到《解放军报》当一名普通编辑。但时过一年，“文化大革命”的狂飙席卷大地，李讷也卷入了这个政治漩涡：她在军报带头“造反”，化名“肖力”（小李的谐音），贴出大字报批判当时的军报总编辑“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不久，军报全面改组，才27岁的“肖力”当上了军报总编辑。以后，毛泽东又把她调到自己身边当联络员，专门负责了解北京各大专院校的情况。（见该书106页）

徐景贤关于李讷的这段介绍，除了第一句话即“1965年夏，李讷从北京大学毕业”是对的，其余所说似是而非，从时序上说，完全是颠倒的。然而，它却被广泛地引用和流行。最近，《南方周末》刊发了一篇题为《毛泽东小女儿李讷的婚事》（2012年6月14日，以下简称《婚事》）的文章，其中关于李讷这段经历的说法，估计也是来自徐景贤的《十年一梦》，这里就不再具用。这也情有可原，不论徐景贤，还是《婚事》一文的作者，他们跟李讷都没有直接接触过，对她没有什么了解，也没对她作过什么采访，仅凭一些道听途说，就演绎成文，犯了史家的大忌。

李讷“文革”初期的经历究竟怎样？我们仅就我们所知道的情况说一说，以就教于方家和知情者。

1965年李讷从北京大学毕业后，没有分配工作，就去参加“四清”了。待她参加“四清”工作结束后，“文革”开始了，她没有回北大，留在妈妈即江青身边，1966年7月，开始参加中央文革小组办公室的工作，和工作人员住在一个楼里（因为她是工作人员中惟一的女同志，有单独的房间），后来她经常住在江青住的楼里。

当时，我们也在中央文革小组办公室工作，因此就和李讷（当时我们都叫她肖力）成了同事。中央文革小组办公室主任穆欣分配肖力处理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收到的群众来信，她很仔细，也很认真，处理得很好。有一天晚上在钓鱼台17楼看电影时，江青跟穆欣说：肖力是刚毕业的学生，她本来就胆小，需要见世面和锻炼，你怎么叫她蹲在办公室里处理来信？穆欣回答：办公室现在没有合适的工作给肖力，暂时让她办信，她可以随时出去活动。

江青这样说以后，穆欣也就不再给肖力分配具体工作了。此后，肖力虽然还是在办公室工作，至于干什么，她可以随意。实际上，她担任了更重要的职务，即当了毛主席的“观察员”。负责了解各大专院校的“文革”运动情况。她去得比较多的院校，有北京政法学院、北京建工学院等，特别是北京地质学院（和地质部）。北京地质学院一个造反派头头后来的回忆，详细生动地介绍了肖力到北京地质学院的情况：

肖力来地院是地院“文革”史上的一件大事，这件事发生在1966年的7月底8月初，那时工作队刚撤离地院，正是在东方红战斗队成立的前后几天。她来到地院后，我接待了她，她从文件袋中拿出一张32开的用粗黑铅笔书写的便笺，字是竖写的：兹派肖力同志为中央文革小组驻地质学院文化大革命观察员。落款是陈伯达。我看了陈伯达亲笔签名的这个便笺，心中十分激动，欣喜若狂。肖力笑着对我说，想和核心组的所有成员见个面，我立马召集。那天核心组到场的有朱成昭、伏庆是、刘长风等。肖力问了我们核心组成员的姓名、年龄、家庭出身和读几年级等基本情况，并作了详细记录，又问了工作队的情况，如队长姓名、什么时候进校、什么时候离校、“反干扰”抓了多少“鱿鱼”、东方红战斗队有多少人参加等等。我们还专门介绍了刘长风，说他是著名作家、长篇小说《创业史》的作者柳青的儿子。大约大家谈了一个多小时，她就告辞走了。

以后她两三天就来地院一次，核心组成员都知道她是中央文革派下来的，但不知道她的真实身份。不过她对地院重大活动都作了很及时和重要的指导，使得我们炮炮打响，一着都没踏空。比如，毛主席1966年8月5日写的《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她在第一时间向我们传达了，并由东方红核心组研究一致通过策划了“一进地质部”的重大行动（按：即地院东方红造反派到地质部的请愿行动，这样的行动前后共有四次——笔者），这件事在北京乃至全国都是一个“首创”，它有力地配合了“炮打司令部”的重大部署，也同时使地质东方红名扬天下。

关于北京地院的这些情况，我们当时就从肖力那里听到过。当时因为李讷属于办公室工作人员，她出去活动，常常回来很晚，有时毛主席找她，江青也牵挂她，这样江青常派戚本禹去找，戚本禹往往叫办公室工作人员和他一起去，或直接派办公室工作人员去，我们都不止一次地去做过这类事情。在这段时间里，肖力还以学生名义到外地串联，大约半个月。

我们说肖力在办公室工作，是办公室的工作人员，还有一个有力的证据，就是办公室党支部（王广宇是组织委员）于7月或8月的某一天，召开全体党员大会，讨论并通过了肖力的预备党员转正问题——这在当时全国党组织都处在停止活动的情况下，大概是一个特例。戚本禹说：“这件事，别的单位不能做，我们能做。”

李讷又是什么时候调到《解放军报》去的？据时任军报代总编辑的胡痴回忆：

那是1966年10月下旬的中午，杨成武打来电话，说江青通知，要我俩下午3时到钓鱼台15号楼陈伯达处，去接受一个任务。我们分别按时间到那里，江青、陈伯达已在等候。江青讲了很多，大意是：请你们来，是想把我女儿李讷送到军队去，让她到军报锻炼锻炼，并说主席也同意。她还说：这孩子才出大学门不久，她学的是历史，肯用脑子，也能写点东西，我看比林豆豆（林彪的女儿）要强些。你们放心，她在政治上是跟我们走的。她的缺点是看问题有些片面，有点固执，要多帮助她。她又叮嘱，为了保密，给她改名肖力（按：其实，她在中央文革小组办公室工作时就叫“肖力”了——笔者），你们俩知道就行啦，否则，她的活动和安全都会有问题。（转引自《肖力与解放军报夺权风暴》，载《百年潮》1999年第2期）

我们认为，胡痴老人的回忆是可靠的。1966年11月份李讷到《解放军报》工作，成为军报的编辑和记者。就在李讷离开中央文革小组办公室时，戚本禹跟王广宇说：“李讷虽然离开了，她还可以回来看文件，只要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可看的文件，她都可以看。”所以，李讷还隔三差五地回来看文件。李讷也是一个造反精神很强的人。她在军报，和其他志趣相投而又调到军报不久的几个青年，1967年1月和8月两次写大字报造反，轻而易举地依次打倒了《解放军报》的总编辑胡痴和党委书记赵易亚，成为军报的总负责人。她告诉我们，林彪为此还接见并鼓励她：“你都27岁了，还没信心搞好一个军报吗？我25岁就当军团长了，29岁担任军政大学校长。”这话，是李讷亲自对阎长贵说的，这表明她对林彪这次接见很高兴和很满意。她主持《解放军报》一年多，搞得那里人仰马翻，教训多多！

1968年1月和3月，我们二人都被江青以“莫须有”的罪名打倒了。1968年3月，江青又调李讷担任中央文革小组办事组组长（办事组1966年12月由办公室改名而来），李讷是6任中央文革办事组组长（或办公室主任）中最后一位，也是完全做到了善始善终的一位。李讷前面的五任：穆欣、王力、宋琼、王广宇、阎长贵，通通都先后被江青、陈伯达等人投入了监狱，成为阶下囚。

以上，就是李讷在“文革”初期的大致经历。如有不对处，敬请方家和知情者指正。

□ 原载《南方周末》2012-07-20

---

|                       |             |          |
|-----------------------|-------------|----------|
| 本期编辑：                 | 《华夏文摘》执行编辑： | 《CND》总编： |
| 胡海科（美国）               | 思语（美国）      | 陈天寒（美国）  |
| 国际统一刊号 ISSN 1021-8602 |             |          |

投稿专用地址：tougao@cnd.org 其它事项请电邮：cnd-cm@cnd.org

如需有关《CND》和《华夏文摘》各种免费期刊和服务的信息，获取

中文文件：hxwz-info@cnd.org 英文文件：cnd-info@cnd.org

《华夏文摘》万维网服务站（WWW）地址：http://www.cnd.org/

---